

金庸小说“走出去”与英汉交流语境中的接受与反思

苏静¹ 韩云波^{1,2}

(1.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2. 西南大学 期刊社,重庆 400715)

摘要:作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金庸小说一度成为“现象级”的跨文化传播热潮,但相比于东亚、东南亚等“汉语文化圈”的风靡,金庸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仍存在许多问题。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金庸小说所涵涉的身份与文化问题是解读其跨语境传播的关键所在,二者共同构建了金庸小说的内部张力,相反相成地塑造了金庸小说的现代性品格。然而这种现代性往往伴随着中西方在理解中的“历史异代”现象,进而影响到叙事传统的解构与新变,从而造成了英语世界与汉语世界对金庸小说理解的歧异。

关键词:金庸小说;文学“走出去”;身份;文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9)03-0073-07

0 引言

随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历史进程,让世界摒弃偏见,了解中国,中国文化“走出去”乃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也是当下文化传播的历史担当。新世纪以来,从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探讨开始,到2011年以后,“走出去”渐成热点,进一步从文化产业层面上升到整体文化层面,着重讨论了中国典籍“走出去”的相关议题。“走出去”投射在文学领域,表现为文学作品的域外传播,不同类型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接受度,其源自文本却又往往溢出文本。作为持续性的文学热点,莫言和金庸是两个十分突出的典型案例,前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者的作品被称为“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但二者在“走出去”的途径与效果上又有不同。有研究者指出,西方译者如葛浩文(胡晨飞,2016)、西方传媒如《今日世界文学》(姜智芹,2017)等对于莫言小说的域外传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金庸虽然已在华文及东亚文化圈取得巨大的市场成功,但在西方世界尤其是英语世界却并未取得轰动效应。那么,两种模式的深层次差异在哪里,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关于莫言小说在西方世界及其主要英译者葛浩文的研究已有众多成果,而关于金庸小说在西方世界及其英译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相对于东亚文化圈在语言形态和文化认同上的互通性,以英语为主的西方世界对金庸小说这类具有强烈“异文化”色彩的文学类型接受度偏低,造成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难,但也恰恰为研究本民族文学在不同文化场域的交流提供了良好契机。

英语世界对金庸小说的研究起步并不算晚,但被引进中国的成果不多,国内研究者对域外成果进行借鉴及回应的更少。这造成了英、汉两个语言世界关于金庸小说的文化沟通甚为不足,结果是双方自说自话甚至自娱自乐,对金庸小说核心内涵的理解因此大相径庭,甚至造成了一些“段子”式的笑谈。比如美国畅

收稿日期:2019-02-21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培育经费资助项目“多卷本《中国武侠小说史》”(14XDSKZ005)、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学术研究规划项目“金庸小说的多元文化研究”(ZGWX2018A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苏静,女,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通讯作者:韩云波,男,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期刊社编审,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销小说评论家阿尔·蒂尔对金庸小说的理解就大大出乎我们的知识储备意料之外,他认为《神雕侠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兴起之初的畜牧业状况”,《笑傲江湖》“反映了中国古代同性恋者的悲惨遭遇”,因此,“金庸先生是一位学者,确切地说,应称为查教授”(2003)。不能说蒂尔的认知毫无道理,但在中华文化圈甚至在亚洲,人们是无论如何得不出上述结论的。由于金庸小说独特的文化构成,跨文化理解存在障碍,英语世界面临文化符码差异的理解困难,汉语世界则可能一厢情愿式地在异文化中张冠李戴。根据相关统计分析,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未较好地展开(邱香华等,2019)。因此,本文立足于国内外金庸小说的研究成果,探索处于不同身份立场的研究(国外学者对金庸作品的“他者”身份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他者”身份)对同一话题的态度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是可以为解决金庸小说跨文化传播提供路径探讨,另一方面则可以将金庸小说作为典型案例探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圆融规律。需要说明的是,以“英语世界”为研究范围,是将其视为一种在东亚、东南亚等“汉语文化圈”之外的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主要泛指欧美地区。文学作品如何通过这道语言的“屏障”并收获怎样的“目光”,是本文论述的立足点。

1 金庸小说的西方“他者”凝视:金庸小说跨语境研究的身份与文化问题

金庸小说跨语境传播已然成为现实,英语世界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多数都未能与国内学界形成沟通。而那些与国内学者形成对话的作品自身所涵涉的多语境阐释空间,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或反思金庸作品和金庸研究提供了新的着眼点。1960年以来,女权主义、同性恋者、少数民族等群体争权运动风靡欧美,身份认同从古典哲学范式走向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将其作为视角介入文学研究成为越来越多的跨文化研究者所青睐的方式。当我们聚焦于金庸小说的雅俗之争、文学史重写等传统命题时(韩云波,2019a),国外研究者则借助新的理论模型将视野转向小说叙事身份建构,为我们审视这一“传统”文本提供了“他者”视野。下文就几位典型的英语世界学者进行分析。

1.1 宋伟杰:民族-国家观念下个人身份的“混杂性”思考

宋伟杰(Weijie Song)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后赴美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普渡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州立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担任助理教授。尽管宋伟杰在北京大学选择了金庸小说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宋伟杰,1999),但其比较文学学术背景使得他主要不是以中国传统方法而是以西方理论为基点来论述金庸小说,这和北京大学1990年代以严家炎、陈平原为代表的学术传统形成了重大差别。宋伟杰以哈佛大学印度裔教授霍米·巴巴的“混杂性”(hybridity)后殖民理论为论述基点,从民族-国家观念的角度解析文本。赴美之后,宋伟杰关于金庸小说研究的成果不多,除了将部分旧作改写成英文之外,主要成果是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五章第三节“*In (Ex)clusion and Chivalric Geography*”(Song, 2018),后以“重绘金庸侠义地形图”为主题改写成中文发表。他从空间介入历史,将金庸小说叙事定位于“后殖民写作”,是对冷战时期香港后殖民想象的回应,其结论是:“其‘增补’式‘后殖民写作’策略所折射出来的,则是香港华语语系文学的政治忧患、历史想象与文化记忆中‘直捣帝都’‘分庭抗礼’,或是‘偏居一隅’的空间移位与定位、离散焦虑与疏解、身份危机与认同。”(宋伟杰,2013)

李泉在总结、梳理宋伟杰相关研究的同时提出质疑,认为金庸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大义和顾影自怜的汉族沙文主义间有明确分界,“没有犯民族本位主义错误,只是从文学人类学层面切入审视事物的角度”。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就将首要关注点向强权势力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异上倾斜,而没有以‘民族’之分确定亲疏界限”,“早在《天龙八部》中,金庸的民族观就已破除了民族有别的预设界限,提升至人本情怀的层面”(李泉,2014)。那么,宋伟杰针对金庸小说潜意识,这乃是深植于文化记忆而难以被主体操控的部分,但“观念”却是可以经过思考而流露于写作的,金庸本人包容的民族国家观念与汉民族本位意识并不矛盾,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以更为客观的文化视角介入研究,否则又何尝不是犯了民族本位意识的错误呢?

1.2 罗鹏: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的多重演绎

借助西方认知哲学和视觉艺术理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罗鹏(Carlos Rojas)的《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

反思》(罗鹏,2015a)一书,系由其博士学位论文修订而来,第五章《金庸与图解民族主义》以《天龙八部》为例,探讨了视觉图像在金庸小说中的叙事功能。罗鹏试图“讨论各种‘想象’社群的社会与心理认同”,一方面探索图谱在读者与外在化的“他者”间建立认同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将图谱延伸至金庸作品本身,认为它们同时具有文化屏幕的投射意义(罗鹏,2015b)。

《天龙八部》中著名的武功图谱有三部:段誉《凌波微步》、游坦之《易筋经》以及虚竹石室壁画。罗鹏通过对图谱的“置换、凝聚和升华的复杂逻辑,使视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必然多变而富争议性”,图谱就凸显了一种绘画与文字所指构成的双重象征系统,人的主体性便据此系统得以重建。罗鹏引入拉冈的“镜像期”或“屏幕”概念,认为金庸小说中的武功图谱与“屏幕”类似,“是进入武功成就的社会-象征体系的入口,而研读图谱,便必然代表了内化其隐含的、经过文化认可的权力‘凝视’”(罗鹏,2015b)。在这里,身份的错认展示了人在自我认同中对权力“凝视”的态度,金庸作品本身就成为华语文化的投射屏幕,全球华人借助这一媒介达成对自我身份的定位。

在中国学者的回应中,李泉(2017)按照武功图谱的表征艺术-视觉图像的仿真性-视觉表象与内在身份的逻辑,指出:“英语世界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明显带有文化批评色彩,更注重从宏观的社会与文化层面探讨作家作品的身份建构问题与性别研究问题,这与国内倾向于感悟式阅读阐释与文本批评的研究迥然相异。”陈风华(2019)认为罗鹏仅仅针对《天龙八部》个案,在综合考量上还有很大延展空间。因此,他以视觉设计语法理论为基础,结合《董培新画说金庸》中相关的十幅插画,从再现意义、互动意义、构图意义和图文关系等角度探索了金庸小说的多模态叙事,把金庸小说叙事的“场面感”与插图系统相结合,模拟了两种语言形态的互文性,进一步论证了金庸小说的文化叙事特征。季进(2015)也指出,罗鹏的个别论述有理论先行的嫌疑,比如对武功图谱的社会身份建构意义的解读,但从视觉文化角度对金庸小说加以阐释仍然是颇具新意且能自圆其说的,一定程度上拓展和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批评空间。

1.3 田晓菲:叙事的民族性与文化的多元性

田晓菲 1989 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即赴美留学,1998 年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1998 年以来,她以《鹿鼎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多次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她提交给 1998 年科罗拉多会议的论文《反讽的消解:金庸笔下的“小说中国”》,经大幅度修改后在中国大陆发表,并将原题目改为《瓶中之舟》(田晓菲,2001)。面对“植根于中国传统”的金庸小说,她敏锐地捕捉到其中被泛常的“中国性”论断所掩盖的丰富文化内蕴,并运用文学、文化研究的双重视野进一步阐释“金庸现象”以及这一现象所关涉的学术思考。田晓菲认为,金庸小说无论在空间安排还是时间架构上都极具“幻设”性的“中国”色彩,借用贝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社区”概念,可将其称为“一个既不存在于现代社会,也从未真正存在过,但是却完美地符合了大众想象的‘中国’”,可归纳为“文化拼盘”、道德世界的构建、“反讽的消解”三个方面。此外,金庸还会有意运用一些带有文化符号的叙事语言,Huss & Liu(2007:15)就指出金庸小说的语言特色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香港的本土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也运用了现代白话的语法和修辞,以此建构了能够被普通读者乃至研究者识别的“中国性”。但田晓菲认为这种“中国性”本身是值得深思的,类似于萨伊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若单单将“中国文化”等作为模糊的概念抛出,会在拉大东西方差距间将中国塑造为“他者”,从而掩盖了国家文化的多元性,这是国家主义所带来的局限性。所以,从金庸小说所展现的“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现象出发,我们应以更为平和、理性的态度对待文学或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

在 2000 年北京会议上,田晓菲进一步提出《鹿鼎记》是一部“后设小说”,“小说作者不断用不同方式——从叙事方式到情节人物的构造——来提醒我们注意,我们阅读的是建筑在一系列文学传统之上的海市蜃楼”,这就构成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自觉地把文学传统当成它的背景”。这一“海市蜃楼”直接导致了“《鹿鼎记》反对民族主义,拥护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国家主义”却是一个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社区”,是 20 世纪而不是 17 世纪中国的现实,是“现代性以及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所导致的一种“中国叙事”(田晓菲,2002)。显然,她的后续研究,仍然沿袭了此前关于叙事民族性与文化多元性的思考。

1.4 韩倚松:离散语境与本土源流中的金庸小说

雅俗辩难、文学空间重构、文学史书写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金庸小说研究关注的重点,季进(2014)借助美国汉学家韩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的博士学位论文《纸侠客:金庸与现代中国武侠小说》(Hamm, 2006)一书,从“作为文本的金庸”“作为现象的金庸”“作为话语的金庸”三个层面重新思考金庸研究的一些重要话题。韩倚松毕业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他专门研究了金庸小说。在文学价值上,季进反思了以往历时论、高低论和内外论三种模式的“排他性”,肯定了韩倚松探索金庸价值的确立与共时的武侠小说书写场域的关系,同时也对韩倚松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例如在雅俗文学的界定上,韩倚松对金庸武侠追源溯流的谱系分析并未真正破除“雅俗二分”的立场,显示出“武侠传统以外无武侠的偏见”;而在离散语境中,韩倚松的民族-国家观念视角再一次强调了“内外论”的排他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田晓菲的观点,正如前文提到的《瓶中之舟》,田晓菲将流亡心态和怀旧意识从空间领域引向时间领域,“揭示出从时间意义上建设本地文化根基和悠久历史的努力”。此外,季进对“金庸现象”中存在的“另类空间”“金庸入史”对学术转型的启示等问题也做了探讨,通过引入西方视野,否定了以往研究中“冲击-反应”论对金庸小说定位的操纵倾向,给予金庸小说等通俗小说主动参与历史的话语权。韩倚松的很多观点虽然与国内研究有所不同,在许多方面显示了西方学界重理性、重实证以及对边缘文化相对包容的特点,在认知理论及研究模型等方面都有可借鉴之处。

2 现代性歧义:两个语言世界的历史异代

金庸小说在亚洲及海外华文圈取得了极大成功,其希伯来文译本出版后也受到以色列大学生的欢迎(Shahar, 1999),但为何在英语世界却受到“冷遇”呢?本文认为,人们在理解金庸小说时所着重强调的“现代性”,中西方在相同物理时间的历史中实际上演绎的是不同逻辑时间的历史,这就造成了某种“历史异代”的现象,进而影响了英语世界与汉语世界对金庸小说理解的歧异,而这些歧义主要是源于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

2.1 中西方不同语境中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错位

许多学者都承认,金庸小说是现代性的产物,如田晓菲所说:“在金庸的个案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对民族主义的抛弃和对国家主义的接受。这种国家主义的历史观是中国现代性的产物。”(田晓菲, 2002)从现代性大框架下的理论方法入手,金庸小说凸显的身份和文化两个角度,构建起了金庸小说的内部张力。一方面,身份内涵和身份认同的多重演绎显示了现代性进程中国家意识对个人定位的不充分性;另一方面,文化的辐散和对民族性的标示又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体现了存在着不稳定因素的民族身份内向凝聚力。由于金庸小说创作的特殊地理空间,作为小说文本的深层次结构,金庸小说的“身份”以民族-国家、地理、血缘等身份标识的“混杂性”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离心力,金庸小说的“文化”则从历史、记忆、语言等意识形态方面构成小说叙事的向心力。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话语权力塑造了金庸小说的现代性品格。

然而,同样是在西方语境,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却断然否定了这种现代性,他说:“金庸小说代表了中国极度向往的传统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作家。”那么,什么是顾彬眼中的“现代性”呢?当他将叶圣陶放到现代性转换进程中之时,现代性就是“无聊”或“无家可归”与“忧郁”(顾彬, 2002)。当他将郭沫若当作“大概是第一个创造现代性的中国人”之时,现代性就是与传统的断裂,“我们从《天狗》来看,中国同欧洲的德国、法国一模一样,是一个以分裂为主流的现代性国家:现代性和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超越所有的传统”(顾彬, 2008)。金庸小说显然不符合顾彬的“现代性”标准,其直接后果有可能是“让我们回到传统和现代的不同上来:将现代文学转变成政治宣传的工具是不可能的,然而,很有可能利用传统形式来改革社会”(顾彬, 2012)。

沿着这一思路,不仅金庸小说不具有现代性,而且“莫言小说有太多的中国元素,影响了小说的现代性”(胡丹等, 2016)。这一论断和中国学者普遍认同金庸小说的现代性品格形成了极大差异,实际上涉及对“现代性”及金庸小说或武侠小说“现代性”的理解问题。顾彬的“现代性”代表了西方激进和颓废的反传统、反

经典的断裂倾向,这本身是基于西方历史文化断裂性特征的,并不能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现代性发生及其表征的标准。在20世纪早期现代武侠小说文类发生的过程中,“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纠结,表现为对现实的失望、与对历史的追寻,以及对时尚的追逐与对传统的惆怅”(韩云波,2017),中国现代性的表现,相对西方而言是温和的、渐进的,是在淡淡的惆怅与追逐中升华为对古典性的摆脱的。中国文学中古典性与现代性的接续,这是与西方现代性历程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当西方按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传统时,金庸小说就成了现代性之外的“他者”。

在中国学者眼中,身份问题依然是金庸小说主人公的核心焦虑,但不同的是,大多数中国学者眼中金庸小说的焦虑并非后殖民的焦虑,摇身一变就成了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狂欢。比如周宁就指出,金庸小说中的身份问题或“身世之谜”,“显现为一个完整的意义系统,其中隐喻的世界观可以描述为:血亲关系是世界秩序的基础,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家族是存在的基本形式,而家族的命运与整个民族与国家都是相通的”,“我们看得出,如此理解世界秩序与个人命运,是最传统,也是最中华民族化的”(周宁,1995)。这显然并非后殖民的身份焦虑,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法焦虑。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需要的并不是顾彬所欣赏的“无聊”或“无家可归”与“忧郁”,而是如何“建构现代人的心灵栖居之所,重新开拓真正具有个体性的意义世界及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空间”(赵恩国,2017)。

无可厚非,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英语世界学者从自身语境出发将中国文化视为需要拯救的落后文化,因而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文化必定充满身份焦虑。当“身世之谜”在金庸小说中得到强势展现之时,这一从古希腊戏剧起就广泛存在的主题阐释与情节技巧方式,就可能被片面强调为金庸小说的“中低端”或弱势文学地位,进而从本能上将金庸小说边缘化。

2.2 身份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异代与现代化转型

对身份与文化关系的思考,有一个历时的转变过程,不仅反映在作家的写作中,也反映在研究者的态度上,这一转变切合了社会现实的发展,因此是一个具有现代性意味的话题。从产生环境来看,文化与身份的冲突多数发生在历史转型期,外在的政权交替、战争威胁等会使原本并行的二者发生错位。例如对民族-国家意识的书写,金庸的早期作品主要将文化和身份定义为“一族之文化”与“一族之人民”,并由此渲染了个人意义上的侠客(小侠)借助“民族-国家”实体而升华为“为国为民”的大侠(宋伟杰,1999:142);中后期作品突出了民族-国家冲突下个人身份的“混杂性”,而造成这一混杂的原因是在政治、地理、战争等强势外力的冲击下,族际文化无法对个人身份形成约束,“再不是靠认同于某一种文化价值可以稳定下来”,“民族英雄”式的大侠也走向个人化的侠客。对比金庸小说的创作时间,冷战时期的香港在“事实”上形成了“文化的身份边界”,人们对传统记忆和文化归属感主观上抗拒着既存的身份烙印,呼唤着一种更合理、更具延展性和包容性的标准来实现认祖归宗的目的,金庸小说的文化书写满足了这一需求,从人情的角度塑造了“身份的文化边界”。

从研究者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正值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时期,随之而来的身份混杂与文化冲击愈演愈烈。宋伟杰的早期研究虽然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解读了金庸小说反传统的一面,体现了金庸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包容性,但宋伟杰的论述仍然将文化置于民族-国家的范畴内,所以才会认同“身份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甚至残酷,再不是靠认同于某一种文化价值可以稳定下来”(宋伟杰,1998)。这里的文化具有国别性,在强势外力的介入下无法成为身份的边界,他原本依靠的文化价值其实是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即“身份是文化的边界”。但是随着西方学界身份研究的深入,以及华语语系文学等相关概念的提出,在后来的写作中作者更倾向于从文化层面来定义身份的归属,北京被“包括在外”,香港被“排除在内”,宋伟杰绘制的“金庸侠义地形图”展现了文化对身份归属的强势制约力,因此反映了“文化是身份的边界”。

当中国的国家身份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中被重新定位,如何在列强环伺的西方格局中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一个历史任务。文化复兴不仅是民族复兴的一个环节,也是民族复兴的一个手段,确切地说是以文化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民族身份的认同感。所以,金庸小说被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提出来,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不仅对港英时期的香港提供了身份认同的依据,也为当下乃至将来更大范围内的华人群体提供

了文化想象的寄托。

3 历史为骨,艺术为翼:叙事传统的解构与新变

文学叙事对人类的精神发展具有永恒关怀,法国大革命以后,现代性意味着确定、永久和整体性的消失,人的存在陷入了环境的转瞬即逝和历史记忆的不断解离的困境中。作为金庸小说的文学生产语境,20世纪中后期的香港在文化归属和西方现代化冲击下进退维谷,这种源于环境的切身体验投射于小说叙事中,最终又透过身份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彰显。一方面,对于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打破了以往的“汉族中心”认识,并进一步影射了“天朝上国”“中国中心”等历史幻觉在全球化争端中的虚幻,民族-国家之于人的成长不再是价值确立的唯一因素,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不稳定,有时甚至会成为一种悖论。例如金庸中后期作品中“为国为民”的大侠最终回归为“爱惜百姓”(韩云波,2019b),在质疑“狭隘”民族观念的同时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没有了族群使命和复仇信念的“行为动机”,大侠的自我将如何确立。从先秦游侠到文艺武侠,侠客的身份都是一个社会性存在,脱离群体关怀去谈侠客意识是没有底气的。因此回归自我就等于回归普通人,是对传统“大侠”形象的解构。对比香港作家在种族发展和文化地位深受打击的境遇中的书写,强烈的文化认同渴望恰恰暴露了自身所处的不确定性境遇,语言文化的不确定性背后是人的生存空间被现代化进程的拉扯,它仿佛是萧峰无法两全的宿命在挣扎中归于尘土,对经典的解构和英雄末路一样充满无奈。

同时,身份符号的不确定性对主体认知造成了混乱。在罗鹏的视觉图像分析中,他从武功图谱对个体身份实质的引介出发,认为金庸作品本身也就成为华语文化的投射屏幕,全球华人借助这一媒介达成对自我身份的定位。抛开武功图谱这一具象性的“屏幕”中介,金庸小说中人物对自身另一层身份的发掘其实是一个认知问题,它有两种解释:即人的多层身份在完整的社会空间中是事实存在的,但人物的限知视角让他/她们只有通过各种机缘巧合才能认识到;人的多层身份以谎言的形式存在于他人的凝视中,人物如果认可了这层身份便会付出相应的社会实践,从而“假戏成真”。因此,“身份”这一原本可以为人的存在寻求立足点的凭证却在事实上扰乱了人的认知,正如同冷战时的香港殖民地乃至生活在当下的普通大众,在现代化进程和保有的历史记忆中茕茕孑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庸小说作为一个召唤文本,“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恰恰是由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符号具有不确定性”(罗鹏,2015b),罗鹏虽然没有就此展开,但这一论述的深刻性在于不仅看到了文化凝聚对于身份认同的向心力,也意识到这种凝聚在现代社会天然地具有不稳定因素,如果把共同语言的识别看作一种通感性的狂欢,则这种狂欢背后或许还包含着某种不安、犹疑和牵强附会。

4 结语

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可以很短暂,也可以很长久,它或许刊登在报纸的某个角落在一天之内就被遗忘,亦或许披着世人的重重目光从流行走向经典。金庸的武侠小说诞生于乱世,却没有止步于乱世,“江湖危机”之下隐伏着作者对民族生存境遇和身份文化问题的深思与喟叹。这呼声或许微弱,却不期然间为天涯散落的“失群者”系上了一根记忆的纽带。如今它已走出国门,向更多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讲述着古老的东方梦幻;它也曾饱受非议,却在这质疑声中收获一代又一代读者。笔底纵横千秋意,书剑何曾掷远声。金庸先生带我们走过了历史和现代,我们也会带着他的作品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 Hamm, J. C. 2006. *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uss, A. & J. Liu. 2007. *The Jin Yong Phenomenon: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M]. Youngstown & New York: Cambria Press.

- Shahar, Meir. 1999. Martial-Arts Fiction and Martial-Arts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Qi in Jin Yong's Novels [C] // 王秋桂. 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05-140.
- Song, Weijie. 2018. *Mapping Modern Beijing: Space, Emotion, Literary Topograph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阿尔·蒂尔. 2003. 外国人论金庸[J]. 银行家(7): 144-146.
- 陈风华. 2019. 视觉“江湖”: 金庸武侠小说多模态叙事[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134-142.
- 顾彬. 2002. 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 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J]. 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75-78.
- 顾彬. 2008. 郭沫若与翻译的现代性[J]. 中国图书评论(1): 116-120.
- 顾彬. 2012. “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J]. 杨青泉, 译.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75-80.
- 韩云波. 2017. 审美与启蒙的悖论: 从王国维的道路看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性历程[J]. 江汉论坛(3): 72-79.
- 韩云波. 2019a. 主流化的创造性转换——论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贡献[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84-97.
- 韩云波. 2019b. 论金庸小说的“中国道路”[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1-12.
- 胡晨飞. 2016. 异域的他者: 葛浩文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J]. 外国语文(2): 142-147.
- 胡丹, 刘毅青. 2016. 不可译性: 顾彬误译论之商榷[J]. 江西社会科学(5): 242-247.
- 季进. 2014. 作为文本、现象与话语的金庸——从《纸侠客: 金庸与现代武侠小说》谈起[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0): 120-127.
- 姜智芹. 2017. 《今日世界文学》与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J]. 外国语文(4): 82-91.
- 李泉. 2014. 混杂的个体身份与历史失忆症——美籍华裔学者宋伟杰的金庸小说身份认同问题研究[G] // 华文文学评论: 第2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75-83.
- 李泉. 2017. 英语世界金庸武侠小说研究——以罗鹏的《天龙八部》视觉图像艺术研究为例[J]. 外国语文(1): 44-53.
- 罗鹏. 2015a. 裸观: 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M]. 台北: 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罗鹏. 2015b. 金庸与图解民族主义[J]. 赵瑞安, 译. 南方文坛(4): 47-53.
- 邱香华, 刘国辉. 2019.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侠文化研究: 基于CSSCI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120-133.
- 宋伟杰. 1998. 身份认同的“混杂”与文化记忆缺失症——管窥金庸的小说世界[J]. 天津社会科学(2): 83-87.
- 宋伟杰. 1999. 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宋伟杰. 2013. “包括在外”, 排除在内, 华语语系叙事策略——重绘金庸侠义地形图[J]. 东吴学术(6): 45-52.
- 田晓菲. 2001. 瓶中之舟[G] // 中国学术: 总第5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3-234.
- 田晓菲. 2002. 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鹿鼎记》, 香港文化, 中国的(后)现代性[G] // 吴晓东, 计璧瑞. 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341-371.
- 赵思国. 2017. 中华传统经典的现代生存根基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反思[J]. 探索(6): 173-177.
- 周宁. 1995. 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J]. 中国社会科学(5): 152-164.

The Acceptance and Reflection of Jin Yong's Novels “Going Out” and the Context of English-Chinese Communication

SU Jing HAN Yunbo

Abstract: As a “common language of global Chinese”, Jin Yong's novels once became a “phenomenon-leve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aze. But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in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etc.,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spread of Jin Yong's novels in the English world. By compar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we can find that the identity and cultural issues involved in Jin Yong's novels are the key to interpreting its cross-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two together construct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Jin Yong's novels, and instead create the modernity of Jin Yong's novels' Character. However, this modernity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generation” phenomenon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the West,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deconstruction and new changes of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thus causing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English world and the Chinese world to understand Jin Yong's novels.

Key words: Jin Yong's novels; literature “goes out”; identity; culture; modernity

责任编辑: 朱晓云